

編後語

2005年年初，一位具有政治象徵性的老人趙紫陽先生逝世。而在整整一百年前1905年的中國，發生了被嚴復喻為「數千年中莫大之舉動」的重大事件，那就是廢除科舉制。在題為「廢除科舉百年」的「二十一世紀評論」中，正如余英時在為本刊撰寫的最新力作中所言，只有認清科舉制的歷史角色，才能理解為甚麼科舉廢止是劃時代的大事。文章從內外四方面論述了「士」在科舉制的建立、設計、推動、改進乃至最後廢止等方面所扮演的關鍵作用，令這一制度在不同歷史時期作出彈性的自我調適；科舉制在傳統中國的經濟和社會文化與政治權力之間，發揮着無形的整體統合功能。可以說，從戰國時代到清末，「得士者昌、失士者亡」始終是理解中國傳統社會的核心理念。既然科舉制與讀書人的理想和生活方式有如此緊密的關係，那麼，科舉制的廢除為何在當時沒有引起士紳階層和讀書人的極力反對？趙利棟綜合大量史料，解讀在新舊制度急遽轉變時期，傳統知識階層如何與舊體制疏離，以及大量被新式學堂吸納。羅志田和何懷宏兩文都是側重考察廢科舉對社會層面的影響。他們分析指出，廢科舉阻斷了中國傳統等級社會的垂流流動，新學堂學費高昂，令民眾識字人數大減；而廢科舉後近代中國城鄉呈現出分離之勢，也令農村基層社會陷入無「士」自治的混亂。但是，廢科舉並沒有終結二十世紀中國的「唯政治」和官本位傳統。

本期的另一個重點，是邀請于建嶸、季衛東、趙曉力和熊易寒討論今年5月1日正式施行的新《信訪條例》。四位學者指出，長期以來，通過信訪解決問題只有千分之一的低效率，上訪民眾集中到北京並日益採取集體上訪等激烈行動，這是由於信訪的政治思想基礎（皇權專制主義）、制度安排（作為一種特殊的行政救濟、向上級負責）存在的嚴重缺陷所致。因此，必須打破目前行政內部監督的窠臼，從國家憲政建設的高度來改革信訪制度。他們建議，在有序民主化的思路下，從外部，如中央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框架以及開放輿論監督、司法獨立等方面來深化信訪制度的改革。

1905年愛因斯坦發表狹義相對論，是人類科學史上劃時代的大事。謝泳利用大量文獻，釐清1949年之前相對論在近代中國的傳播和對知識界的影響；李濤討論1950年代中國如何全面引進蘇聯模式，確立蘇式高等教育體制；曹清華則檢視了1930年代「文藝大眾化」討論中左翼作家對「大眾」一詞內涵的塑造。此外，李振宏考察孔子「不患寡而患不均」名言的意義，分析這句話如何從孔子時代的「政教均平」政治治理觀念，逐漸演變為目前仍頗為流行的代表平均主義的經濟思想；陳宜中、蔡孟翰從日本近年來的國族復興運動分析中日關係緊張的原因。以上五篇文章都可以看到，思想觀念對社會思潮、體制變化乃至民眾情緒的影響，值得向大家推薦。

最後，城市面貌的塑造，如動用數百億港元、銳意把香港打造成亞洲文化藝術中心的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，正牽動着香港各界的神經。丁燕燕介紹了這項龐大文化工程的來龍去脈，並指出其爭議之處；而作為對此一計劃持質疑立場的重要民間聲音，胡恩威也提出了其關注所在，擔心其可能淪為香港官辦文化和低俗娛樂的展示廳。